

Firm-and-Even's Records from Beyond the Seas:

The Second Collection of
A Different View of Ancient History

海外夷堅志

—— 古史異觀二集



Edward L. Shaughnessy

Zhang Shuyi

Jiang Wen

David Fuquan Mo

莫福權
蔣文
張淑一
譯

夏含夷
著

Firm-and-Even's Records from Beyond the Seas:

The Second Collection of
A Different View of Ancient History



Edward L. Shaughnessy

Zhang Shuyi

Jiang Wen

David Fuquan Mo

莫福權

蔣文
譯

張淑一

夏含夷
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海外夷堅志：古史異觀二集／(美)夏含夷著；張淑一，蔣文，莫福權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325-7968-6

I. ①海… II. ①夏… ②張… ③蔣… ④莫… III. ①中國歷史—古代史—研究 IV. ①K220.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34281 號

海外夷堅志：古史異觀二集

[美]夏含夷 著

張淑一 蔣文 莫福權 譯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蘇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635×965 1/16 印張 18.25 插頁 2 字數 220,000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100

ISBN 978-7-5325-7968-6

K·2165 定價：6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序 言

在 2012 年出版的《興與象：中國古代文化史論集》的《自序》裏，我說到之所以收集了中文論文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早就決定了自己的學術圈子應該以中國為中心”，並引用了李零教授說我發表研究成果的時候“以中國人為聽眾”的評價。這一點也不錯，現在我大多數的寫作都使用中文。然而，我畢竟是一位美國教授，仍然有責任參加美國和西方學術活動，包括寫作英文文章。因此，幾十年以來，有些學術論著一直沒有公布給中國讀者。

我收集資料編入《興與象》的時候，台灣同仁正在翻譯我早年的英文著作：*Before Confucius: 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孔子之前：中國經典誕生的研究）。這項翻譯工作進行了很多年，譯稿終於在 2013 年出版了。在該書的《序言》裏，我說：“現在校對幾十年前所做文章的中文翻譯，一方面我對內容都很熟悉，但是從另外一方面卻感到相當矛盾，有一點覺得自己並不認識作者。”我又繼續解釋，之所以不認識作者，一邊是因為我自己的興趣一直在變，幾十年前的“我”和現在的“我”不一定是一個人（至少沒有完全相同的學術興趣），但是另外一邊——可能更重要——是因為那些文章原來是給西方讀者寫的，現在看中文譯文的時候，不知道是否能夠完全表達原意。該書出版後，讀者反映相當不錯，給我很大的鼓勵。正好那時訪問廣州華南師範大學，認識了張淑一教授，她給我看她前年的拙作《西周歷史》長篇文章的

翻譯稿，我感覺她翻譯得很好，我們就開始想收集另外一些拙作英文文章，編為一個小冊子。通過張淑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生蔣文女史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語文系研究生莫福權先生的努力，這個工作進行得很順利。現在出版的書是他們所作的貢獻。

翻譯學術著作是非常艱苦的工作，能夠表達原意就很不簡單。西方學術著作與中國學術著作不但語言不同，而且在形式上至少有兩個明顯的不同。美國學術界很重視專題單行本書，年輕學者都要專門研究規模相當大的問題；相對來說，西方學術界相當輕視學術論文，除非老先生，基本上不會出版論文集。與此不同，中國學術界非常重視論文集，除非是青年博士生，很少出版單行本書。以中國古代文化史學界為例，李學勤先生是最顯著的學者，已發表了上千篇學術論文，很多都收集在各種論文集裏，但是所出單行本書都是針對西方學術界寫的。因此，我自己的中文論文雖然不少，但是英文論文不多（有一些是介紹性的，完全沒有必要翻譯），現在只收集了四篇，多半是篇幅相當長的文章。

西方和中國學術界另外一個重要不同是，西方學者很重視書評，特別是長篇書評論文；而在中國，基本上沒有人寫書評，偶爾寫書評，也多是介紹性的，沒有多少評價。我自己雖然也不愛寫書評（寫書評很容易得罪人），但是作為美國教授偶爾感覺有責任寫。有的書評完全是介紹性的，就沒有包括在本書中。我的書評和一般的書評有一點不一樣，多半是長篇書評論文，不但對某一本書做評價，並且對相關問題做更深入的討論。本書收集了十篇書評，大概可以反映西方學術界的這一特點。

論文的學術範圍仍然與拙作中文文章的範圍相似，即中國古代文化史，包括諸如甲骨文、金文和簡帛的出土文獻學，與傳統文獻，特別是《周易》《詩經》《老子》《竹書紀年》，等等。然而，不但文

章的形式與中國學者所作可能有一點不同，而且討論的問題和探索的方法可能也都不太一樣。因為文章原來是為了西方讀者寫的，所以多數針對西方學術界經常討論的某些問題，特別是口傳文學與文獻學的關係、考古學出土的物質文化與傳統歷史文獻的關係、古代文獻諸如《老子》的寫作過程等諸問題。讀者會發現我的立場和另外一些西方漢學家的立場大不一樣：很多西方漢學家談到傳世文獻的創造和流傳時，強調口傳因素，而我比較重視書寫過程。在某種程度上，這種不同應該是根據不同人的不同教育背景 and 不同研究對象而發生的。其他西方學者在西方古代文化史方面可能受到比較好的教育，而我卻於這方面沒有專門培養。相反，我這輩子一直在研究中國出土文字資料和傳世文獻，當然會強調書寫成分。另外一些人重視文化的比較，知道古代希臘以口傳文學為主流，可以利用這樣的例證來理解中國古代文學，也不無意義。

值得指出的是上面所提的《西周歷史》一文，原來是1999年出版《劍橋中國古代史》裏的一章。我知道中國讀者相當關心這本書，一直想把它全部翻譯成中文。然而，到現在為止，唯一的中文部分仍然是我自己翻譯的《序言》，發表為《西方漢學的古史研究》。現在能夠再提供一篇，當然不能代表全書的內容，但是至少可以滿足一部分中國讀者的要求。

如上面所說，本書的翻譯者是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張淑一教授（八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生蔣文女史（四篇）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語文系研究生莫福權先生（兩篇），每一位都做了非常詳盡的翻譯，蔣文將全書校對一遍，以便保證統一的格式，我自己也再三校對了每一章。因為文章和書評原來是為了西方讀者寫的，所以“洋味”在所難免，但是通過各位翻譯者的努力，能夠將拙作某些英文文章介紹給中國讀者，還是相當有意義的，謹此向張淑一、蔣文和莫福權表示懇切謝意。

目 次

序言..... 1

上篇..... 1

中國歷史與銘刻..... 3

西周歷史..... 26

《周易》爻辭探源..... 84

論郭店楚簡及其在二十世紀《老子》學史上的地位..... 98

下篇..... 137

周原甲骨：進入了研究階段嗎？..... 139

評《西周文明》..... 162

早期中國軍事史..... 171

評羅泰《孔子時代》..... 196

解謎與新收穫：評《竹書紀年》、上古年代和倪德衛
著作..... 201

評散復生《中國早期戀歌》..... 226

哲學還是竹子：戰國寫本的寫作和閱讀..... 230

評李孟濤《具象化文本》..... 241

注解、哲學與翻譯：《周易》王弼注新讀..... 256

評鄭吉雄《易圖象與易詮釋》..... 277

上 篇

- 中國歷史與銘刻
- 西周歷史
- 《周易》爻辭探源
- 論郭店楚簡及其在二十世紀《老子》學史上的地位

中國歷史與銘刻

當今為考古發現所證實的中國最早文字約出現在公元前 1200 年，商（約公元前 1500—前 1045 年）王武丁統治的時期。該文字以兩種面貌出現：刻寫於龜甲或牛骨上的刻辭，西方通稱為“甲骨文”，以及鑄造在青銅器上的銘文，通常所謂之“金文”。甲骨文所記錄的祈禳試圖貞卜包羅萬象的未知之事，包括——但不局限於——戰爭、狩獵、農業、天氣、疾病、生育，等等。一些卜辭還包括了商王對於祈禳能否成功的占辭（也可能是對於事情是否確如願望或預言的追溯）。最早的青銅器銘文只有器物所有者的名字，大概是為了用於宗教活動（尤其是獻祭祖先）才鑄造的。漸漸地，銘文發展成為對於某一值得紀念的重大事件的記載，通常是王室對作器者的某次賞賜。直至周代（公元前 1045—前 256 年），無論是甲骨文還是青銅器銘文都不斷地被製造出來，儘管兩種銘刻都經歷了重大變化。本文將只考察迄至公元前 8 世紀的銘刻，雖然當時其他類型的文字記錄也開始出現在了歷史文獻當中。事實上，不管是在甲骨文還是在青銅器銘文中，都已經有了——無論直接還是間接——關於當時其他類型、可能是寫在更容易滅失的材質如竹木上的文字記錄的證據。雖然在當前所討論的時代裏，還沒有任何一種此類文字記錄被發現，但它們作為歷史記錄的重要性卻可能比現今所知的銘刻更重大。

在中國，歷史學家們通常將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看作傳世歷史文獻的源頭。然而在西方，一些學者近來已開始討論因這兩種

銘刻都生成於宗教儀式的語境之下——其一在於預測未來，另一在於紀念過往——所以其本身不應被視為歷史記錄。這一新出的議論建立在一個大前提之上：這些記錄僅僅是被寫下來，並不意味着其切實反映了歷史真貌，並且在相當程度上受其所處語境和主人主觀意圖的左右。這一前提固然很重要——事實上——也很關鍵，但是它是適用於所有文字記錄的，而並非僅適用於與宗教活動相關的那些，這也是歷史學家們所熟知的。在有足夠和明確限定條件的情況下，我們利用中國古代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來重寫其所處時代的歷史是可以的，利用其預測某些在後世中國歷史傳統中生發出來的旨趣也是可以的。

一、甲 骨 文

占卜可以描述為某人對未來的虔誠期待。儘管使用龜甲進行占卜在中國至少沿續到清朝(1644—1911年)，同時一直有關於商代的王也進行此類占卜的傳言，但直到接近清末的1899年，當今所知的最早的刻辭甲骨才最終被揭示出來，同時被認識到是從商代流傳下來的記錄。著名古器物 and 古文字學家王懿榮如何差遣僕人到北京的藥鋪去買“龍骨”以治療其所罹患的瘡疾，以及後來如何辨識出上面的刻辭為中國最早文字樣本的故事，如今已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的傳奇。1903年發表的王氏甲骨刻辭集引起了人們對於甲骨埋藏地的探尋，這一探尋很快到達了位於中國河南省北部中心安陽市郊的小屯村，顯然這是因為安陽以歷史記載中的商代晚期都城聞名。而小屯村最終成為始於1928年、由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進行的發掘的第一地點，並於1950年成為為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護的第一個考古學遺址。當地的發掘一直持續到今天。除了大量發現的建築和墓葬遺址，以及豐

富多彩的商代物質生活標本外，還發現了數以萬計的帶刻辭的龜甲和牛骨碎片。

在這些發現中有三處最為重要：殷墟 YH127 坑，發掘於 1936 年 6 月，出土了 17 000 片斷代為商王武丁時期、並帶有與王室活動相關的刻辭的龜甲；一個號稱小屯南地的地方，發掘於 1972 年，出土了約 6 000 片牛骨，並被證實對於全部商代甲骨刻辭的準確分期至關重要；一處位於花園莊，發掘於 1990 年，出土了 600 片完整的帶刻辭的龜腹甲，時代與 YH127 大體相同，但明顯屬於不同的家族或文化背景。與所有這些商代甲骨不同的是 1977 年陝西省岐山縣鳳雛村——嗣後之周的心臟地帶——一處重要窖藏裏的刻辭龜甲的發現，其清楚表明即使在商已經被周推翻之後，甲骨占卜依然被使用。在已過去的上個世紀裏，對於這些刻辭的研究已經發展成一個高度專業化的學科，西方一般稱為“甲骨學”。儘管目前已有數以萬計的刻辭這一特性（和難題）使得甲骨學成為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領域，但它們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的先驅地位注定了其重要性。在下文中，我將簡述它們是怎樣被製造出來的，揭示了當時怎樣的歷史，以及它們可能顯示哪些歷史編纂學的內容。

（一）甲骨刻辭的產生

在中國，甲骨刻辭的專業術語是“甲骨文”。“書於甲骨之上”反映了這些刻辭的通常刻寫材料：龜的腹甲（平滑的腹部）和牛的肩胛骨（從肩膀直伸至前腿的長而光滑的骨頭）。這些材料大概最早因宗教和占卜的意義而被挑選出來：牛可能首先被用於祖先祭祀，而以長壽聞名的龜，在中國自古以來便被視為極其神聖的動物。二者皆能提供相對較大和平滑的可供書寫的平面，而商代的貞人也充分利用了這一特性。無論牛骨還是龜甲都預先在兩面當中較粗糙的一面鑽鑿一系列小孔備用（皆為動物身上朝向內臟的一面），這些小孔幾乎——但不完全——穿透至另一面。在占卜過

程中，一條通常很具體的有關未知事項的“命辭”會被傳達至甲或骨，然後一根灼熱的木棍將被放至鑿孔之一，這會造成一道壓力裂紋（兆）出現在甲骨的反面。這些裂紋呈“卜”字形狀，而在刻辭當中“卜”就是象形字，意為“因兆決卜”（“卜”的發音大概也是擬聲的；該字的原始讀音可能類似“嘆”）。

商王——極少數情況下為其他官員——會檢視這些裂紋以判定所占事項的吉凶。過些時候，一條卜辭便會被刻在甲骨的相關裂紋旁邊。這些卜辭通常包括現兆的日期（以中國古代六十日一循環的干支日期之一標注），以及/或者主持了本次占卜的貞人的名字；在甲骨學中，這部分卜辭通常被稱為“敘辭”。接下來是“命辭”。在已知最早的卜辭（“師組”卜辭）當中，這些卜辭含有正反的問題，但此類卜辭很少，並且看起來只存在於武丁在位早期。在最常見的商代卜辭中，從武丁晚期（“賓組”卜辭）開始，命辭逐漸發展成為對貞占卜，以一條肯定句居於龜甲之右（從閱讀者的角度看），一條否定句居左，大概類似於摘雞菊式的占卜——“她愛我，她不愛我”——美國小孩子玩的把戲。到商代晚期，這種對貞命辭讓位於單向的、概念上的肯定表述（“旬亡禍”和“王到某地，往來亡災”是迄今最常見的命辭）。在隨後的周代，命辭一律以某種禱告結尾（“思亡咎”“思克使”等）。命辭之後是占辭，通常以語句“王占曰”為先導。某種值得注意的神學轉變是，商王武丁的占辭幾乎總是負面的或悲觀的（預測某些災禍），而到商代晚期，當占卜的範圍已大幅縮小時，占辭卻總是積極的（簡化為“王占曰吉”）。最後，在某些情況下，卜辭中還包含驗辭，基本上都是證明商王的占辭確實應驗了。

（二）甲骨卜辭所見歷史

武丁時期的甲骨卜辭不僅是目前已知中國最早的文字記錄，而且它們還占據了全部商代甲骨卜辭的大半壁江山，並且其中有較高的比例可以看作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如上文已提及，這些卜

辭幾乎涉及商王國家與個人事務的每一方面（事實上，對於商王來說，它們似乎並沒有國家與個人事務的區別）。商王定期地向祖先（卜辭證實保存於傳世文獻中的商王世系是正確的，除了一個次要細節）、天氣、年成、巡狩、田獵等獻祭，他還占卜更具體的事務，包括戰爭、新農田的開闢、新城邑的建立、其數量龐大的妻妾的生育，以及他本人和其他王室成員的各種疼痛與不適。本文不可能對所有這些王室事宜都予以詳錄。然而如果只是從最基本的意義上，卻能夠顯示，有關戰爭的卜辭可以怎樣被用來重建當時歷史的一些得失。

依據有關商代的十分粗略的傳世文獻記載，是武丁的伯父盤庚首先遷都至安陽附近，而那裏也確實有豐富的考古學證據支持此說。這意味着在此次遷都不久以前，商王的勢力還很疲弱，並且被很多問題困擾，遷都安陽是為了尋求某種安全。有較好的證據顯示，在武丁統治的某個早期階段（該早期階段為賓組卜辭所涵蓋，約為公元前 1210 年），商牢牢控制着環安陽地區，並且向西擴展遠至太行山脈，向南越過了黃河，向東深入了山東半島。甲骨文中大量關於商征伐位於今山西省西南部的政治體，北方遠越汾水，可能已經到達分隔今山西和陝西兩省的黃河南北走向部分的内容，武丁聯合各個方國，將商的霸權推進到了更遠的西方。這些征伐有些是由一位名為“雀”的商人將軍或盟友（可能為王室的女婿）領導的：

庚申(第 57 日)卜，王貞：雀弗其隻缶。

雀弗其隻缶。（合集 6834a）^①

戊午(第 55 日)卜，般貞：雀追豆出隻。（合集

6947a)

① 這裏引用的商代甲骨卜辭多數遵從胡厚宣的著錄號，胡厚宣主編，《甲骨文合集》13 冊(n. p. 1982 年)。

癸卯(第 40 日)卜, 殷貞: 乎雀銜伐亘, 戠。 (合集 6948a)

儘管這些卜辭只記載了商打算實施這些征伐, 很少有驗辭證明這些征伐取得了實際成功, 但武丁在位晚期的其他卜辭暗示, 至少某些商人征伐的目標後來成為了商人的盟友。

己未(第 56 日)卜, 殷貞: 缶其來見王。一月。 (合集 1027a)

壬辰(第 29 日)卜, 貞: 亘亡田。 (合集 10184)

己丑(第 26 日)卜, 賓貞: 戊受又。 (合集 561)

在這三條卜辭中, 商王卜問缶、亘(在別處“亘”被稱作“亘方”, 顯示其曾被視為敵國), 而戊也以此被納入了有關朋友或盟友的卜辭。就這些方國來說, 戊似乎是被置於商人控制下的最西方領土。大概因為, 其可能是被滅掉的曾經的最早盟友之一, 時間或許是在走向武丁漫長統治末尾的重要戰爭發生的公元前 1190 年代早期。戰爭似乎是由土方, 尤其是位於商更西和更北的敵人舌方挑起的。

己丑(第 26 日)卜, 殷貞: 令戊來曰, 戊伐舌方, 在十月。 (英藏 1179a)

己巳(第 6 日)卜, 賓貞: 舌方弗允戠戊。 (合集 6371)

同樣, 這些是命辭而非驗辭。不過, 在走向該朝代末期的卜辭中, 戊或者戊方, 如其有時被稱呼的那樣, 重又成為商人征伐的目標, 這表明其又叛離了。

在商代最後兩個王帝乙和帝辛統治時期, 商人的軍事注意力似乎已經轉向了家門口。那時, 多數卜辭變成了例行公事, 如下面出自一系列有關抵抗淮河流域之人方的漫長戰爭的、約一百五十篇卜辭中的例證所顯示的:

癸酉(第10日)卜,在攸,泳貞:王旬亡畎。王來征人方。(合集36494)

通過比較標注於這些卜辭敘辭中的日期和地點,大概可以在相當多的細節上重建商人軍隊的行軍路線和日曆。事實上,通過這一重建的跨越九個多月的日曆,還可以判定戰爭始於公元前1077年秋天,直至公元前1076年春天——這一日期可以作為重建上古中國政治年代學的基石之一。

不過,這時的有些卜辭,還是很長很複雜的。其中或許出自帝乙在位早期的一篇(很可能是出自其在位的第九年),似乎是打算率領眾多盟友去攻打某位孟方伯炎——大概是位於離安陽盆地不遠、山西東南部沁水沿線的一個方國——的首領。該卜辭非常難懂,帶有大量第一次出現在卜辭上的辭例(而且由於其出現時已接近該朝代末期,因而也是最後一次),現隸定如下:

(敘辭:)丁卯(第4日)王卜,貞:(第二敘辭:)今田巫九畎。(命辭:)余其从多田于多伯征孟方伯炎。蚩衣翌日步,亡尤。自上下于𠄎示,余受又又。不𠄎𠄎。告于兹大邑商,亡𠄎在畎。(占辭:)王占曰:弘吉。(後記)在十月。邁大丁翌。(合集36511)

雖然該卜辭現今已經令人遺憾的不完整了,但其在同時期的、記載本次征伐(儘管可能並非同一次戰爭)結果的卜辭中,肯定是稍長甚至是較長的一篇。據我所知,這不是一次占卜記錄(雖然命辭可能存在於卜辭已經佚失的部分),而是一次大捷的記錄。儘管很多保留下來的詞句仍容易受不同解讀的影響,但它還是顯示了商人擊敗了至少三個敵人,俘獲了它們的首領和無數的兵士及軍備物資,之後殺死了那些酋首(用他們為祖先獻祭)。

……小臣牆从伐,擒危美……人二十人四,而千五百

七十，𠄎百丙，車二丙，盾百八十三，函五十，夫……用又白
 慶于大乙，用𠄎白印，……于祖乙。用美于祖丁，俚甘亭，
 易……（合集 36481 正）

如我們將在青銅器銘文中看到的，金文中有一種普遍的強調積極面的傾向，總是想要打敗敵人，當然，也從來沒有紀念過自己的失敗（很多學者都有忽略金文記載的這種主觀性的傾向）。就商人來說，儘管有打敗這些敵人的勝利，但在不久之後，將會有一個更難對付的、將商翦滅的敵人出現——周。

（三）作為間接材料的甲骨文

西方首席甲骨學者吉德煒 (David N. Keightley) 用了如下自白開啟他有關卜辭性質的最後課題之一——一項帶有刺激性標題的研究：“貞人手記：作為二手史料的商代甲骨卜辭”。

很多年來，我一直認為這些卜辭是原始資料——占卜之後立即作為曾經切實發生之事的記錄刻寫於獸骨之上。雖然這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是真的，但我現在認為有相當數量的卜辭屬於二手材料——有時是縮略過的，有時是改動過的——就現今已經佚失的原始記錄而言。^①

吉德煒展示了各種類型的證據證明，很多卜辭不可能在占卜之後立即刻上，同時其他卜辭涉及的具體信息來自占卜發生的很久以後。這可以以武丁統治時期的三條牛肩胛骨卜辭為例證，其中的前兩者事實上是非占卜記錄（中國學者稱之為“記事

① David N. Keightley (吉德煒), “The Diviners’ Notebooks: Shang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as Secondary Sources” (貞人手記：作為二手史料的商代甲骨卜辭), 載於 Yau Shun-chiu (遊順釗) 和 Chrystelle Maréchal (麥里筱) 合編,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commémorant le centenaire de la découverte des inscriptions sur os et carapaces* (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Cang jie, numéro spécial. (Paris: Langages Croisés, 2001), 11 頁。